

中国哲学发展史

任继愈主编

❀ 秦 汉 ❀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哲学发展史

任继愈主编

(秦汉)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中国哲学发展史
(秦汉)

ZHONGGUO ZHIXUE FAZHANSHI
(QIN HAN)

任继愈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印张 576,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800

书号 2001·292 定价 4.60元

前 言

《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上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下迄东汉的灭亡。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哲学不称“两汉哲学”而称为“秦汉哲学”,觉得这样更能反映历史的实际。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创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体制。秦朝国祚短促,保存下来的思想资料不多。汉承秦制,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都沿袭秦朝,只是它改进了统治方式,使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得以稳定。由于汉人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口头上力图与暴秦划清界限,似乎汉朝的成功都是一反秦人之道。事实上,秦汉两朝有区别,但区别不象汉人所说的那样大,秦汉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主要的。秦汉两朝开创了支配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秦汉奠定了基础。

西汉东汉中间,夹着一个短命的王莽政权。它是西汉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王莽政权与秦政权都只维持了十几年,但秦朝为后来的历史开创了新局面,王莽政权不过是两汉之间的一幕插曲。

秦汉四百多年间出现了三次农民大起义。农民起义不但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面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早在战国时期,有远见的思想家已经预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荀子曾警告统治者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庶人的威力

究竟有多大，当时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充分领教过，也没有深刻的认识。秦王朝的统治者只看到压迫人民给它带来的利益，万万没有想到它会被起义农民的锄头所埋葬。汉朝顺应农民起义的大浪潮，夺取了政权，才真正认识到农民的威力。汉初君臣们共同总结亡秦的教训，制定了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政策。

第二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西汉之末和王莽政权时期。第三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东汉桓灵时期。这两次农民大起义在政治上、哲学上都有所反映。忽略了农民革命的作用，秦汉四百年间的哲学发展就讲不清楚。这种作用有时是哲学家明确地讲出来的，虽然有的哲学家没有直接讲到，但他们讲的平治天下，最终目的还是防止农民造反，巩固封建统治。

秦汉哲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为统一封建帝国探索、准备统治思想的时期。从《吕氏春秋》起，黄老思想、陆贾、贾谊、司马迁等人的哲学都属于这一阶段，历时百年。《吕氏春秋》出现在第一次农民起义以前，其余各家都在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后，因而，它们的哲学思想各自表现出时代的痕迹。

第二阶段，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历时二百年，这是汉朝统治思想确立和巩固阶段。汉武帝以儒家统一各家，由官方制定神学经学为思想统治的武器。通常所说的两汉经学统治，就是指的这一阶段。西汉末年轻学形成三大支派，一是今文经学，二是古文经学，三是纬书经学。东汉政权建立于农民起义之后，政府看到神学经学对政治统一的作用，为了消除三派经学的分歧，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经学体系。《白虎通》一书是由皇帝出面制定的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只能信奉，不能怀疑。神学经学获得绝对权威，它也从此僵化了。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一股在野派的思潮。这股思潮的代表

人物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用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批判神学经学。扬雄、桓谭、王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的言论官方不支持，不能得到推广，但他们的学说抑制了反理性主义、独断主义、盲目服从、人云亦云的倾向，使哲学思想的内容趋于务实、清新。

第三个发展阶段为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

东汉中央政权的基本支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豪强大族。他们通过察举制度享有入仕特权，出现了累世公侯的一些家族。豪族之间又互相援引、誉扬，在各级政权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凭借出身而据高位，实际上有一些是鄙劣无用之才。东汉皇室家族，出现了不少短命的皇帝。幼主当政，不得不由青年母后代管，青年母后只好援引自己娘家兄弟来协助管理国政。即史书上所谓外戚干政。小皇帝长大，便联合宦官驱逐外戚，大权又落在宦官手中。这样反复循环，造成中央政权的极不稳定。官吏无能，皇帝昏庸，朝廷政局不稳定，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这次起义，虽被豪强大族武力镇压下去，但社会矛盾迄未消除，中央政权名存实亡。皇帝的绝对权威已经动摇。神学经学已不再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消除社会弊端，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种种方案，他们批判的锋芒指向神学经学，指向现实政治，指向社会风气，形成批判思潮。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人应时而起。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为后来魏晋玄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秦汉之际，宗教神学占据当时思想统治地位，笼罩着、影响着哲学，这是秦汉哲学的特征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逐渐摆脱西周以来的天命神学的控制。当时列国纷争，诸侯割据，地上王权力量不能集中，天上神权也受到削弱。春秋战国时期，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相当活跃，神权已在动摇。秦汉统一后，地上王权不断巩固，统治者要起用神权以求配

合，这时，宗教神学得到重建^①，统治者利用神权来巩固其政治统一。建立神学经学，提倡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对当时的西汉政治统一起了配合作用。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无法摆脱宗教异己力量的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宗教的蒙昧主义、反理性主义、反科学的神学世界观给哲学发展的不利影响决不可低估。象王充那样的杰出的无神论者，反谶纬迷信，却相信符瑞。

秦汉时期的哲学家，殚其智力，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社会结构，政治治乱，人性善恶，命运祸福等问题，都引起他们深切关注。他们往往没有把神学、哲学、科学三者的关系条析清楚，分别给以适当地位。三者时有混淆，造成互相干扰。从人类认识的总进程看，秦汉哲学基本上讲的是关于宇宙构成的认识之学。魏晋玄学则为本体论。由宇宙构成论发展到本体论的过程，也正是秦汉哲学到魏晋玄学所经历的过程，它是符合人类认识的逻辑发展的。治哲学者每喜先秦哲学之创新及魏晋玄学之空灵，或不甚喜秦汉哲学之滞重。事实上由先秦到魏晋必经历秦汉哲学这个阶段。不经蝶蛹之蠕蠕，何来蝶舞之踟蹰？此不可不察。

本卷撰写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有孔繁、任继愈、牟钟鉴、李申、余敦康、钟肇鹏、韩敬同志。

① 据《史记·封禅书》，汉武帝时，认为五帝(青、黄、赤、白、黑)之神代表五方，在五帝之上还应树立一个总管五帝的神，称为“太一”之神。“太一”与上帝是一是二，还需研究，但武帝立“太一”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同时出现，当非偶然。

目 录

前言	1
《吕氏春秋》——秦汉哲学史的开端	1
一、关于《吕氏春秋》这部书	1
二、《吕氏春秋》的特色和思想构成	6
三、宇宙观和天人关系论	21
四、历史观和社会政治理想	34
五、认识论和若干思维经验教训	46
六、人性论、生死观和养生之道	56
七、军事理论和音乐理论中的哲学思想	62
八、《吕氏春秋》的历史地位	69
秦王朝对封建统治思想的探索	76
汉初黄老学派	95
一、黄老联称及黄老之学的起源	95
二、《黄老帛书》的时代和作者	101
三、《黄老帛书》的思想分析	106
四、黄老之学在汉代的流传和演变	124
从陆贾到贾谊	132
一、西汉初年的政治形势和陆贾到贾谊的思想发展	132
二、陆贾的仁义观和贾谊的仁义观	134
三、从“无为”到“有为”	138

四、陆贾和贾谊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144
五、德有六理	155
《礼记》的封建宗法主义思想	161
一、《礼记》的时代和内容	161
二、《礼记》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	170
三、《礼记》的宗教和哲学思想	196
四、《大学》和《中庸》	219
《淮南子》——西汉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	245
一、《淮南子》其书	245
二、“道”与宇宙演化论	253
三、“无为”与认识论	261
四、形神、养生和人性	269
五、“道”、“事”与历史观	278
六、社会政治思想上与《吕氏春秋》的同异	288
七、关于《淮南子》的评价	293
司马迁的进步史学	301
一、《史记》与司马迁	301
二、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	306
三、社会历史观	309
四、天命鬼神观	314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	321
一、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建立	322
二、“天”的宗教意义	325
三、“天”的至善的道德属性	329
四、人副天数	335
五、天人交感，同类相动	338
六、省天谴而畏天威	343
七、王者承天意以成民之性	348
八、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	352

九、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355
十、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及历代对他的评价·····	359
扬雄摆脱神学经学和创立新儒学理论的尝试·····	364
一、扬雄的生平、学术活动和政治态度·····	364
二、批评神学经学，复兴正统儒学·····	369
三、新哲学体系的创立及其内在矛盾·····	382
四、扬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409
纬书综述·····	416
一、谶纬的兴起及其在经学中的地位·····	416
二、纬书的编纂流传和篇目解题·····	431
三、纬书的内容和易纬的思想分析·····	439
《白虎通》的宗教神学·····	456
一、两汉之际的经学和白虎观会议·····	456
二、《白虎通》的法典性质和核心思想·····	474
三、《白虎通》的神学世界观·····	491
王充的批判哲学·····	508
一、生平、政治态度和著作·····	508
二、综合儒道，博通百家·····	513
三、王充对神学和迷信的批判·····	518
四、王充哲学体系的矛盾·····	528
五、王充思想方法的经验教训·····	535
六、王充哲学对后代的影响·····	541
汉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544
一、汉代自然科学的历史地位·····	544
二、农业、农学和哲学·····	554
三、天人感应和自然科学·····	558
四、天文学与哲学·····	566
五、音律学与气、数·····	579
六、数、数学和易数·····	594

七、汉代医学与当时对世界统一性的探索·····	601
八、炼丹术和万物可变思想·····	626
九、结语·····	633
汉代中后期道家思想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 ·····	637
一、道家思想的唯物主义传承·····	639
二、道家思想的唯心主义发挥·····	643
三、道家向道教的转化·····	652
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 ·····	697
一、东汉末年神学经学的没落和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697
二、社会批判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712
三、社会批判思潮的哲学思想·····	732
人名索引 ·····	749
书名索引 ·····	754

《吕氏春秋》——秦汉哲学史的开端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中国前夕，从时间上说，它属于先秦阶段，可是从它所代表的思潮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来说，把它作为秦汉哲学史的开端就更为适宜。该书编者编纂此书，是直接为行将统一的封建皇朝提供思想统治的理论体系。它在秦朝未被采用，但对于汉代的政治和思想却有重大的影响。就学术思想的演变而言，它开启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汉书·艺文志》把它著录于杂家。以后的学者，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只肯定该书的史料价值，而认为它的学术思想漫衍无所归心，不成一家之言，评价较低。我们要革除偏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还《吕氏春秋》以本来的面目和历史地位。

一、关于《吕氏春秋》这部书

《汉书·艺文志》记《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吕氏春秋》分纪、览、论三大部分，纪十二篇，览八篇，论六篇，总篇数与《汉书》同。每篇又有子篇若干。十二纪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纪有纪首一篇和论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纪共计六十子篇。八览各览有论文八篇，但《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子篇。六论每论有六篇，共计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纪末的《序意》一篇，全书计有子篇

一百六十。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是此书最古的注本，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清代毕沅有《吕氏春秋新校正》。其他清代学者如梁玉绳、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对该书的校释皆有所贡献。现代学者许维通于1933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集各注家之大成，较为详备，是迄今较好的版本。

今本《吕氏春秋》在史料上的真实性，历来少有争议。但在该书的写作年代、作者以及览、论、纪的顺序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需要加以辨正。

成书年代。《序意》载吕门学者向吕不韦请示十二纪的问题，“维秦八年，岁在涒滩”。^①由此可知，该书约成于公元前239年左右。其时秦王政约二十岁，吕不韦为相邦，尊称仲父，封文信侯，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吕不韦以辅佐帝业的功臣自居，拥有雄厚的势力，门下客士云集。有了这样的条件，他才能组织大批学者，编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

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记·太史公自序》）。明代方孝孺提出责难：“太史公以为不韦徙蜀，乃作《吕览》。夫不韦以见疑去国，岁余即饮鸩死，何有宾客，何暇著书哉？”断言“太史公之言误也”（《吕氏春秋·附考》）。这是对司马迁的误解。《史记》说的是《吕览》传播的时间而非成书时间。《吕不韦列传》中说得很清楚，该书编写于吕不韦为秦相的鼎盛时期。不得把“世传”改为“乃作”。“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也不是讲的成书时间。

有一种说法：《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天下之后^②，理由是《安死》中有赵、魏、韩三国“皆亡矣”的话，故书成较晚。此说难以成立。吕不韦被秦王政赶下台并自杀以后，门客星散。暗为其送

^① 引自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出版。以下引《吕氏春秋》原文、注文及附考文，皆据此书。

葬者，或被逐迁，或被夺爵（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余摄于秦王淫威，避祸犹且不及，何敢冒株连之险去补缀《吕氏春秋》？即或有个别忠诚者将初稿续而成书，有何力量将此新作流布开去，以至于取代了曾悬于咸阳市门并广泛流传于世的原书呢？纵观全书，作者描写的是秦统一六国前夕的社会状况，未见到有秦一统天下后的踪迹。《振乱》、《谨听》说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兵革未息，世主恣行。按：西周君亡于前 256 年，东周君亡于前 249 年，秦王政又未称皇帝，故无天子，这正是战国接近尾声时的情景。毕沅在《安死》的“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下注道：“《续志》注作‘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这一更正是重要的。《安死》把列国归为三类：一类是“尝亡”之国，如齐、荆、燕；一类是“已亡”之国，如宋、中山；一类是“失其故国”之国，如韩、赵、魏。按：齐国于前 284 年曾为燕国乐毅攻破，荆楚于前 278 年、前 241 年两次战败迁都，燕国于前 315 年为齐攻占。这三国皆失陷过都城，可以说在历史上曾经亡过国，但后来又败而复立，故曰“尝亡”。宋国于前 286 年为齐国所灭，中山国于前 296 年为赵国所灭，皆亡而不复，故曰“已亡”。赵国于前 262 年长平之战后衰落，魏国在前 342 年马陵之战后衰落，韩国连年兵败，时而依于楚，时而附于秦，已不能独立自存。这三国虽未失其都城，但不复有战国初、中期那样强盛国力，故曰“失其故国”，即丧失了原有强国的地位，而国家尚未灭亡，因而与宋、中山有别。在前 239 年前后编写的《吕氏春秋》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可见，《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成的。

② 近人徐复观根据《吕氏春秋·安死》中有“赵、魏、韩皆亡矣”的话，认为“这分明是秦政二十六年以后所写的”，因而推断“《吕氏春秋》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至秦政统一天下之后。”（见《两汉思想史》卷二，第 54 页，台湾学生书局 1979 年再版。）

关于该书作者。《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说：“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由此可知，《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主持，众多学者参加而写成的。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作者人数相当可观。《史记》说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人。门客中有各种技能人才，未必尽为文士，对“人人著所闻”的“人人”一词当然不可过于认真，大约作者为数不少。这些文人学士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派的文化知识，然后汇集于此书，使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司马迁语），成为先秦学术上的一部百科全书。第二、吕不韦的主导作用不可抹杀。人数众多的写作队伍，观点各异，吕不韦能够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按既定的纲目撰写，这项组织工作是一种创造。本书内容上广收博取而又有它的宗旨和主线，各部分之间基本上是协调的，它体现了吕不韦为将要诞生的大帝国设计蓝图的政治用意。可以推知，其间经历了必要的学术讨论、观点统一和增删修订的工作方才成书的。这里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编，编出来的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吕氏春秋》，只能是本文文集。

汉以后有些学者怀有偏见，不承认吕不韦编书的历史功劳。如宋代黄震的《黄氏日抄》，清代卢文弨的《书吕氏春秋后》，都断言该书的编写，吕不韦“固无与也”（均见《附考》），好象吕不韦对该书没有贡献。其实，吕不韦直接指导该书编写，是有案可查的。《序意》记载了门下客为写十二纪向吕不韦作请示，吕不韦规定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写作原则，《吕氏春秋》这部书确实贯串了这一原则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轻贱商人的风气。吕不韦由商人一跃而为秦相，封建知识分子总觉得其来历不正，加以吕不韦用计谋立子楚而取秦国，更被视为阴谋起家的政客，没有什么本事。实际上，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更加

强盛；他决策或指挥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应该肯定他是一位政治家，兼有军事才能。现在还应指出，由于《吕氏春秋》这部书，吕不韦还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眼光比同时代人要看得远一些；不仅在力促全国的统一，而且还在考虑统一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其水平应在范雎、蔡泽等前任之上。他有着自己的哲学和系统的社会政治思想，但他不囿于一家之言，而能总揽百家，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关于《吕氏春秋》中览、论、纪的顺序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根据《史记》的《吕不韦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八览在前，次六论，次十二纪。另一种根据高诱所注《吕氏春秋》及序，认为吕书原是十二纪在前，次八览，最后六论，并说司马迁首列八览和以《吕览》称呼该书，或是由于行文不检，或是为了行文方便。

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司马迁是介绍《吕氏春秋》最早的学者，他治史严谨，对于自己亲见的史籍，不会在记述时随意颠倒顺序。他在指明该书“号曰吕氏春秋”的同时，又称其为《吕览》，固然为了行文简便，那也是由于八览在先。有些学者以书名来推断十二纪在前，如宋代王应麟说：“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附考》），清代毕沅说：“以十二纪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吕氏春秋·高诱序》注）。其实，以“春秋”名书和十二纪为首与否毫不相干。“春秋”一词虽起源于季节，但已被引伸为古史的通称。《吕氏春秋》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从内容上说，八览在前也顺理成章，首览是《有始览》，从天地生成说起；次《孝行览》，再次《慎大览》，论治国经世，合乎著书起步的章法。十二纪以阴阳五行配四时纳入政令、农事等社会活动，形式上成一整齐的系统，作者放在全书之末以为总结。且古人著书，序言放在书末，而《序意》恰在十二纪之后。今本《吕氏春秋》，《序意》在书中间，与古书体例不合。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高诱有擅改篇章顺序之

嫌。高诱序说：“不韦乃集儒书（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以十二纪为首。他不是故意抛开司马迁的说法，而是他当时所看到的《吕氏春秋》即是那种纪、览、论的顺序。同一本书，从西汉到东汉，三大部分的顺序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与社会思潮的改变有关。西汉初中期，道家思想占优势，儒学还不是正式的经学，阴阳家的思想的社会影响也不突出。自董仲舒以后，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糅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五行与四时相配、政令与时令相通，成为多数儒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东汉，阴阳灾异之说最盛，当时的人们认为《吕氏春秋》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十二纪，十二纪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各纪的纪首。于是十二纪就在这种气氛中被置于全书之首了。况且该书原以竹简、木板联串成册，次序甚易变动。篇次的改动最初也许是偶然发生的，由于这样排列更合乎时代精神，便被肯定下来，流传到今天。

还有一个问题：《序意》既是全书的序言，为何只提到十二纪，而未涉八览、六论？我们认为，今本的《序意》明显是残篇，豫让刺赵简子的故事是后人由它篇补入的。可见《序意》残缺甚早，脱漏的内容不得而知，焉知未提及八览、六论？《序意》中吕不韦论法天地的原则，不仅是十二纪也是全书的指导思想，只要肯定下这一点，也就够了。

二、《吕氏春秋》的特色和思想构成

《吕氏春秋》是一部奇书，与它的前人及同时代学者的著作相比，其内容与形式都有独到之处。

在内容方面，首先它能够以积极和客观的态度对待先秦文化遗产，公开地申明要采集诸家之长，超出学派门户成见，将各家学说中在它看来有价值的成份组织到一起。它这样做，反映了时代